

概要

生产率增长是长期提升生活水平的关键动力。全球金融危机后，生产率增速急剧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前就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且此后生产率增速始终低迷不振。本文在使用了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数据的新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了危机遗留问题和结构性不利因素在阻碍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普遍下降且持续低迷。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加之发达经济体投资疲软，是较危机前趋势出现产出损失的主要原因。虽然不能排除测量方法可能存在日益明显的问题，但生产率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存在的。对于发达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在危机前就已减速，危机后又大幅放缓；而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其生产率增速放缓则打破了危机前生产率加速增长的趋势。
- 与之前的严重衰退一样，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使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迟滞”的现象，即在一次看似暂时性的大规模冲击后，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受损。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与过去衰退不同的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薄弱，加之信贷环境收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处于困境的企业对无形资产进行投资，从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部分发达经济体，繁荣-萧条的金融周期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薄弱，使得资本错配现象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增多。**二是在**总体需求疲软、投资与资本型技术变革三者间存在着负反馈循环，这似乎使发达经济体深受其害。**三是**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远离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这可能进一步损害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些危机的遗留问题正在逐渐退去，但它们仍是生产率增长的重大障碍，这在欧洲大陆尤其如此。
- 在危机前，一些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就已经制约了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与危机相关的一些因素则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尤其包括：通信技术带来的繁荣正在消失（其先出现在最发达经济体，随后对其他经济体产生溢出效应）；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发达经济体尤甚）；人力资本积累减缓；全球贸易一体化放缓（包括中国融入全球贸易的进程已趋于成熟）等。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并不那么清晰，全要素生产率追赶的潜力仍然巨大，但之前的结构性改革和转型的效果正在退却，这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解决危机的遗留问题，可能是近期最有希望提高生产率增速的方法。这在欧洲大陆尤为如此，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给欧洲大陆留下的负面影响仍大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提振需求（包括解决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薄弱问题、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加大对高回报基建项目的投资力度）将吸引私人部门进行更多投资并承担风险，同时改善资本配置。这可以扭转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反馈循环，帮助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摆脱当前的低增长陷阱。

- 从中期来看，生产率增长的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突破能够推动生产率增速再次提升，不过提升的幅度和时间点难以预测。在那之前，即便能够解决危机遗留问题，由于存在结构性问题，生产率增速也不可能恢复至发达经济体 90 年代末或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本世纪初的水平。政策制定者应主动应对结构性问题的影响，包括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出开放贸易和移民的政策等，这些政策在过去几十年大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政策制定者应该确保国内民众和各国之间能够广泛分享这些成果。此外，还要对创新、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政策予以关注。